易地扶贫搬迁户收入结构差异归因及优化路径

张二申[1] 乔家君[1] 周亚娟[2] 王伟[11]

（1.河南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4；

2.武汉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文章基于大别山片区湖北省域内 38 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微型角度将所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家庭收入科学分类。借助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 detector）和 Tobit 模型（Tobit model），探究搬迁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变和收入高低的影响因子，确定影响因子解释力优先序列和显著性，结合分析结果提出适宜建议。结果表明：(1)收入结构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家庭类型和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驱动力最为显著。(2)各影响因子分别作用于家庭工资性、生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的贡献度有所不同，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3)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巩固提升工作，应因户施策地引导搬迁户选取适宜家庭未来生计生活提升的收入结构优化路径。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 Tobit 模型 优化路径 收入结构 农户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8；D63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2）01-0144-08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为精准扶贫工作中最具特色、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工程，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独特创新，也是人类迁徙史和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壮举。易地扶贫搬迁是完成 2020 年精准扶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调整农户原有经济结构，改善生计来源条件，促进家庭增收，达成脱贫致富目标，实现精准扶贫脱贫“五个一批”中的一项重要举措。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1]。目前国内外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学者，关注点已经由如何让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向如何“能发展、能致富”聚焦。如何使搬迁户在进入新的生产生活环境后，实现“能发展、能致富”的目标，是当前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的重点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享受各类帮扶政策的农户，其家庭收入以及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国内贫困地区、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取得大量关于农户生计变化及优化的成果。张伟等认为贫困地区政府应该对现行补贴政策进行优化和调整，推动贫困农户实现精准脱贫[3]。司静波等认为家庭禀赋好、生计负担轻、政策落实到位的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和比例较大[4]。李聪等认为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家庭规模、耕地资源、信贷可得性、兜底政策等都是主要影响因素[5]。邝希聪等认为金融政策支持可有效提高贫困地区农户人均收入[6]。Koen Caminada 等发现，社会转移性收入对家庭人员主要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非常有效[7]。尹志超等认为各类帮扶政策对劳动力占比少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作用更明显[8]。王小华等认为工资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在家庭经济中的相对贡献率逐年

[1]**作者简介**：张二申（1994—），男，河南杞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与乡村振兴。E-mail:937799134@qq.com；乔家君（1973—），男，河南睢县人，河南省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E-mail:jjqiao@hen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20、41671172）

上升[9]，其中祝伟研究发现影响省级农户收入差距的收入结构类型，工资性收入起正向作用，经营性收入起反向作用[10]。蔡磊等认为新时期脱贫工作应重点关注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11]，张琛则认为加强农户非农就业培训是减缓农村居民收入极化的重要措施[12]，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在建档立卡户样本中，房屋政策、产业帮扶政策、转移就业扶贫政策、金融扶贫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收入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且农户享受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更有利于家庭收入增长。沈宏亮等认为精准扶贫对各类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多元化的扶贫政策，促进一般户、低保户、五保户收入增长作用依次增强[13]。易地扶贫搬迁户作为享受特殊政策的低收入群体，收入结构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仍缺乏相关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涉及搬迁户搬迁后生计保障、后续发展全过程[14]，易地扶贫搬迁户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5]、防止返贫的重点关注对象[16]。让农户“挪穷窝”的易地扶贫政策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下的一种创新扶贫模式[17,18]，农户在搬迁后仍作为农村社会中的基础单位，不仅要面对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变[19,20]，更重要的是农村自然纯朴的农耕、农林生活方式向城镇化生活方式转变，搬迁后所面临的经济收入方式转型问题更加突出，承担的社会和自然的双重风险更加明显[21]。收入结构的转变及优化路径的选择决定着搬迁户未来生计能否可持续，也决定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成效的最终结果[22]。探究搬迁户收入结构差异及可持续发展路径是本文主要研究点。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

湖北地区地貌复杂、地势悬殊，灾害频发，域内有武陵山、秦巴山、大别山和幕阜山四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含 12 个市（州）、68 个县（市、区），自 2016 年实施湖北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计划以来，共完成 31.84 万户、88.23 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搬迁人口约占全国总搬迁人口的 1/10，是全国完成易地扶贫脱贫一批重要区域[23]。本文以湖北省麻城市三河口镇为研究区域，该镇位于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区中的大别山片区重要节点，是长江、京九两条经济带的交汇地域，同时联接武汉城市圈与皖江城市带，版图面积 380.36km^2，境内山地面积占总面积 80%，丘陵占 20%，平均海拔 320m，是麻城市进行精准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第一个优秀试点城镇，搬迁安置工作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城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选取的研究对象均为易地扶贫搬迁户，覆盖三河口镇 38 个村庄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全部农户。

1.2 研究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①2020 年 9～10 月期间，调研小组在研究区域内（图 1），对所有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农户以普查的方式进行访谈，调查数据涵盖受访家庭构成基本信息，主要包含人口构成、健康情况、出生日期、学历、性别、劳动力状况等；生产消费信息方面主要包含耕地林地资源拥有量、年度家庭收入支出、政策帮扶等；个体感知要素主要包含信贷可获得程度、设施满意度等）。②大别山片区样本区域范围、高程数据、区位条件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中科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中心和 91 卫星地图。③镇域区位条件、地形地貌等数据来源于麻城市统计年鉴。调研受访搬迁户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调研结果和安置点居委会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除访问对象特殊原因（走亲访友、生病住院、外出务工、沟通困难等）导致无法访谈而放弃调研外，对剩余搬迁户共进行了 558 份问卷调查。排除逻辑错误、填写错误、问卷损坏的 34 份问卷，最终整理可用问卷 524 份。在进行指标选取时，受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入户访问调查方法的局限性，经与本文研究的其余作者研讨，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选取了包括家庭基础、生产资料、社会资源在内的三大类能直观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经济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 10 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与农村发展具体情况，家庭基础类指标中设计了家庭类型[24,25](x_1)、抚养比（x_2）[26]、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28](x_4)3 项具体指标；生产资料类指标选取了符合研究区农业发展实际的人均耕地面积[29](x_5）与人均林地面积[30](x_6)2 项指标；社会资源类指标则主要选取了贷款难易程度[27](x_3)、享受政策的数量[31](x_7)、安置点至最近城市距离[32](x_8)、基础设施满意度[33](x_9)、搬迁安置措施[34](x_{10})5 项具体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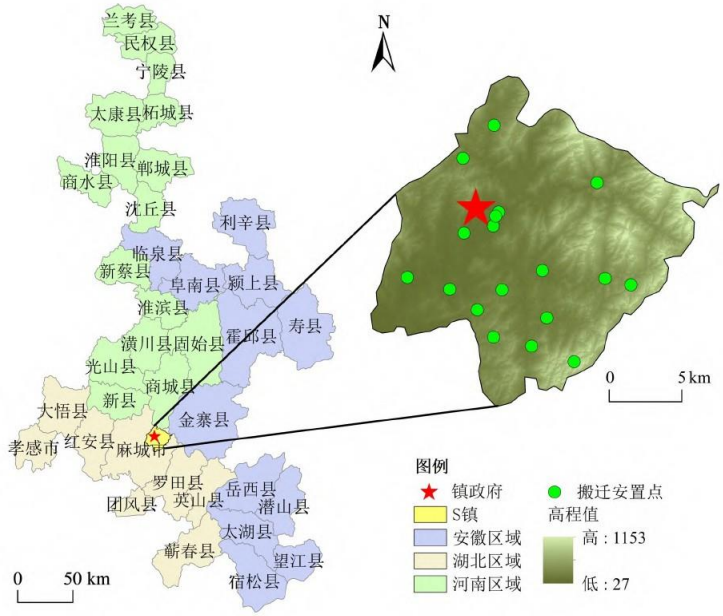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大别山片区的研究区安置点空间分布

2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主题，本文以湖北省大别山地区内典型易地搬迁镇的 38 个村为研究对象，借助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指标标准与目前国内外研究中收入结构标准，将搬迁户的收入结构划分为四种类型，借助以下研究方法，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农户家庭收入中结构转化、收入差异的驱动力和显著性，探究适宜搬迁户家庭未来发展的收入结构优化路径，针对不同现状搬迁户提出合理的发展建议。

2.1 地理探测器

搬迁户各收入类型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情况，其中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远低于其余三种收入类型，在对家庭整体经济收入的研究中影响作用不明显，不作为研究指标。通过引入定量指标 S，对各收入类型进行代入分析（1）:

$$S = \frac{N_i}{W + R + T} (i = 1, 2, 3) \qquad (1)$$

式中：W 代表搬迁户收入类型中工资性收入；R 代表搬迁户收入类型中生产经营性收入；T 代表搬迁户收入类型中转移性收入；指标 S 代表由工资性收入（N_1）、生产经营性收入（N_2）、转移性收入（N_3）在搬迁户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作为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变量。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等人提出的一种统计学方法[39]，用于探究多因素驱动力对因变量影响，应用于人地关系、贫困特征、城镇化特征、专业村演变、城乡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借助此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户家庭收入构成的影响差异进行探测分析，根据公式（2）求得：

$$q = 1 - \frac{\sum_{h=1}^{L} N_h \sigma_h^2}{N\sigma^2} \qquad (2)$$

式中：L 为因变量或自变量的分层，即分类或分区；N_h 和 $\sigma 2_h$ 分别是层 h 单元数和方差；N 和 σ 2 分别为研究区整体的单元数和方差。q 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力越强。

2.2Tobit 回归模型

由于易地搬迁户这一特殊低收入群体获取经济来源的方式不同，某些收入在部分样本中为 0，各类收入的全局探测不再选取 Geographic Detector，借鉴国内外研究中探测居民收入影响因子的方法[40,41,42]，选取 Tobit model 对数据进行回归处理。根据回归结果仅对同类型影响因子贡献度比较，不进行交互分析，于是对调研数据的标准化处理选择 zscore 标准化法。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rho_{(w,r)} = \lambda_0 + \lambda_1 F_n + \lambda_2 \delta_n + \theta_n \qquad (3)$$

式中：ρ 代表样本中特定类型收入；F_n 表示其余指标变量（X_1～X_7,X_9～X_{10}）；δ_n 表示安置点至最近城市距离（X_8）；θ_n 表示误差项。为方便读者解读本研究成果。

3 结果分析

3.1 影响因子探测

地理探测器输出各因子探测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影响因子解释力由高到低为 x_1>x_4>x_2>x_5>x_6>x_7>x_3>x_8>x_9，其中搬迁安置措施（x_{10}）因子具有解释力但显著性不明显，贷款难易程度（x_3）在 5%水平上显著，其余因子均在 1%水平上显著。

从搬迁农户家庭基础条件进行分析，家庭类型（0.4440）、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0.3612）、抚养比（0.2845）三者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影响因子，说明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家庭原本的基础条件对经济收入的影响最大。

从易地搬迁农户的生产资料情况来分析，人均耕地面积（0.1153）、人均林地面积（0.1135）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力都比较强。从事农业经营的搬迁户所投入的时间、精力与所拥有的耕地资源成正比，耕地资源越多，投入的劳动力相对而言也就越多，从而减少了从事兼业活动的投入。农户所拥有的林地资源面积越大、参与林业收入分配的经营类型（尤其是研究区域内的竹林、经济林）越多，促进农户增收越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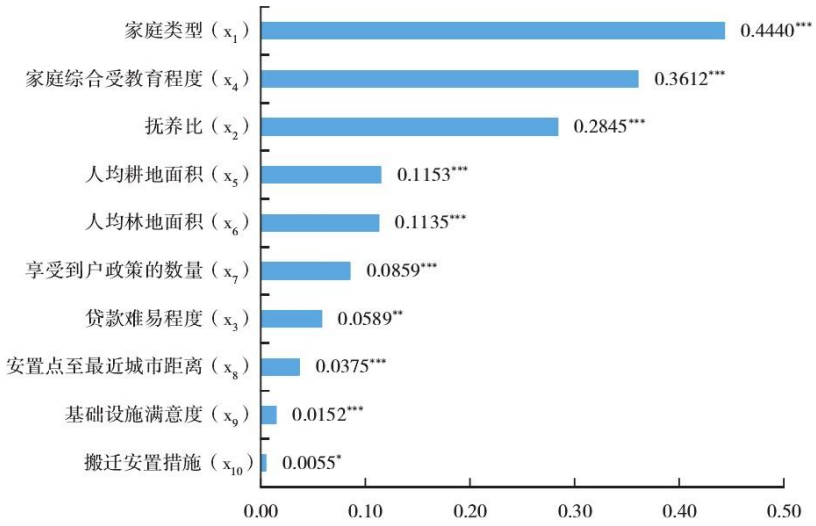

图 2 影响搬迁户收入结构的单因子解释力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从易地搬迁农户所享受到的社会资源进行分析，享受到户政策的数量（0.0859）的影响力较强。依据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不同搬迁户家庭分别实施农业创业扶持、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扶贫小额贷款、教育补助、医疗补助、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帮扶措施，可以有效减轻农户家庭医疗、教育、生活等负担，一定程度解放家庭劳动力，增加劳动力的就业、创业机会，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在增加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和生计策略选择方面效果良好，这种帮扶效果对于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为转移性收入的农户家庭较明显，主要由劳动力缺乏和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较大的因素导致，政府的帮扶措施可以有效稳固其现有生活状态。贷款难易程度（0.0589）、安置点至最近城市距离（0.0375）、基础设施满意度（0.0152）的影响力较为接近，究其原因，研究区域搬迁户贷款方式更多的是通过扶贫小额信贷（政府贴息、门槛低）、亲戚朋友等渠道获得借款，政府支持、熟人社会特征明显，贷款能够为劳动力较多且家庭成员具有经营头脑的家庭提供从事农业或工商业所需要的资金，有利于搬迁户形成长期稳定的职业发展。安置点和最近城市的道路距离代表了搬迁安置点的区位条件，从安置点到城市的便捷程度不只体现在节省时间方面，还可以获得大量的就业创业机会、农业经营信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农村长期大力投入，持续改善乡村村容村貌，满足了大部分农民生产生活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生存环境内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有助于更好地开展生产活动，提升家庭日常生活水平。

在单因子解释力探测结果的基础上，将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因子进行交互探测，得到探测结果，双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解释力均高于单一因子，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相比于单因子单独作用，双因子交互作用的 q 值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双因子交互作用结果中，家庭类型（x_1）对其他因子的影响最强，交互作用 q 值与单因子作用相比增长多倍。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x_4）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仅次于家庭类型（x_1），探测结果相比于其他单因子作用结果也高出多倍。而抚养比、贷款难易程度、人均耕地面积等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与单因子作用相比均有明显增幅。结果表明：①受多种要素的综合影响，单因子探测、双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探测结果能够对收入结构的变化呈现更好地解释。②各影响因子交互后，主要呈现出双因子增强的交互类型，交互作用值均高于其中任意单因子。③少部分影响因子交互后，呈现非线性增强的交互类型，交互作用值大于双因子作用值之和，交互结果产生“1+1>2”的作用。

3.2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 Stata16.0 软件中 Tobit 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影响因子回归结果。根据经营类型将生产经营分为农业经营、个体经营两种形式，其中个体经营型搬迁户样本量占比较低，单独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没有研究意义，因此将两者均纳入生产经营性收入进行回归分析；转移性收入按照所获支付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政府转移性支付和私人赠与转移性支付，考虑到研究对象均为享受国家精准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农户，绝大多数农户获得的政府转移性支付远远高于私人赠与，在回归模型中不作区分。

4 优化路径选择

搬迁户的收入结构与家庭收入在内涵上存在不同，前者体现的是在生计策略方面的选择，后者体现的是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产出值。根据各类模型方法分析结果，将收入结构优化过程分为收入结构转型和收入提升两个阶段。收入结构转型阶段各要素按关注优先度排序依次为家庭类型、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抚养比、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享受到户政策的数量、贷款难易程度、安置点至最近城市距离、基础设施满意度。在收入提升阶段，生产经营性收入提升要素按优先度依次为搬迁安置措施、安置点至最近城市距离、享受政策的数量、抚养比、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人均林地面积；工资性收入提升要素按优先度依次为家庭类型、贷款难易程度、享受政策的数量、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抚养比、人均林地面积；转移性收入提升要素按优先度依次为贷款难易程度、享受政策的数量、安置点至最近城市距离、抚养比、家庭类型、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

4.1 根据收入来源确定帮扶措施

通过对易地搬迁农户各类收入来源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出各收入类型影响因素情况，如图 3。为调整易地搬迁农户收入结构，稳定其后续生计问题，应该根据农户的不同家庭情况施以不同的帮扶措施。

第一，加大教育帮扶力度。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对搬迁农户工资性收入及生产经营性收入均起到较大的正向引导作用，因此对于家庭有正在接受教育的人员应该加大教育帮扶力度，以此推动搬迁农户后续的发展潜力，使其获得更为长久稳定的发展。

第二，实施就业帮扶。人均林地面积作为研究区较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不仅对搬迁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也对搬迁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说明对于部分劳动力多、劳动能力强的搬迁农户家庭来说，过多发展第一产业实际上限制了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使农户丧失了其他的发展机会，不利于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对劳动力条件较好的家庭实施就业帮扶，为搬迁农户介绍务工机会，积极招商引资，发展搬迁地的第二、第三产业，丰富搬迁农户的经济来源渠道，鼓励耕地林地进行集体间转让，以期达到劳动力的最优化分配。

第三，在政策兜底基础上，增强农户自身发展能力。享受政策的数量虽然对于搬迁农户的转移性收入有较为明显的正向作用，但对其工资性收入及生产经营性收入均表现出负面影响。一方面在于享受政策较多的多为孤寡老人，其自身劳动能力弱，大多依靠转移性收入保障生活，另一方面反映了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户思想上的惰性，部分易地搬迁户由于享受政策较多，足以支撑生活，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家庭收入多依靠政府资助，收入结构不合理。因此对于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易地搬迁户的后续发展，一定要避免政策兜底的帮扶措施，应坚持“扶贫不扶懒”的原则，通过政策宣传、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手段，增强农户自身造血功能。

第四，利用贷款引导产业发展，增加收入。贷款难易程度对搬迁农户的工资性收入起到负向影响作用，对转移性收入起到正向影响作用，即贷款难度越高，农户工资性收入对应较低，转移性收入对应较高，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搬迁农户的贷款用途不够合理，较少用来发展生产经营，基于此种情况，当地政府在后续帮扶时应注重跟进农户贷款的使用情况，引导农户通过发展产业的方式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率。

第五，注意将分散安置搬迁户安置在社会服务便利之处，优化其收入结构。集中安置型搬迁一般会选择距离城镇较近的区域，相对于分散安置农户会远离原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生产不便，因此会降低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安置点距离最近城市较近的也大多有这种情况，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调研队在走访中发现，集中安置农户除整村搬迁的情况外，多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户，对于这类农户，政府大多依靠兜底保障政策进行帮扶，其收入结构较为单一，应将该类农户集中安置在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较为便利的地方。分散安置的搬迁户应注重其收入结构的优化，根据劳动力情况与生产条件进行经济收入结构引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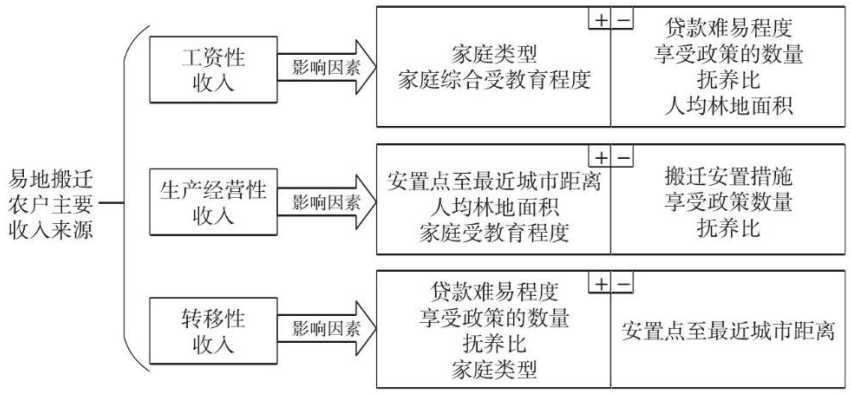

图 3 易地搬迁农户收入结构及影响因素

4.2“一户一策”收入结构优化路径

对于不同的易地搬迁农户，家庭基础条件、生产资料条件、社会资源享有的完善程度均有所差异，应该提出“一户一策”的收入结构优化路径，如图 4。对于家庭基础条件比较完善且生产资料条件较好的农户，应该重点提高其生产经营性收入，提高家庭受教育成员的文化水平，在原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鼓励农户进行耕地及林地集体内承包，引导农户提高农业种植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及特色农业；对于家庭基础条件及社会资源较好的农户，应重点提高家庭工资性收入，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条件，在政府扶持政策的帮扶下，积极参加技术培训，提高务工质量及收入水平；对于家庭生产资料条件及社会资源较好的农户，应提高其转移性收入以保障农户基本生活，一方面农户可通过进行耕地、林地集体间流转获得稳定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应对该类家庭基础条件较差、劳动力少、抚养压力大的搬迁户给予财政帮扶，保障其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对于家庭基础、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条件相对来说均较好的农户，应以提高家庭整体收入为目的，合理安排劳动力职业分配，优化家庭收入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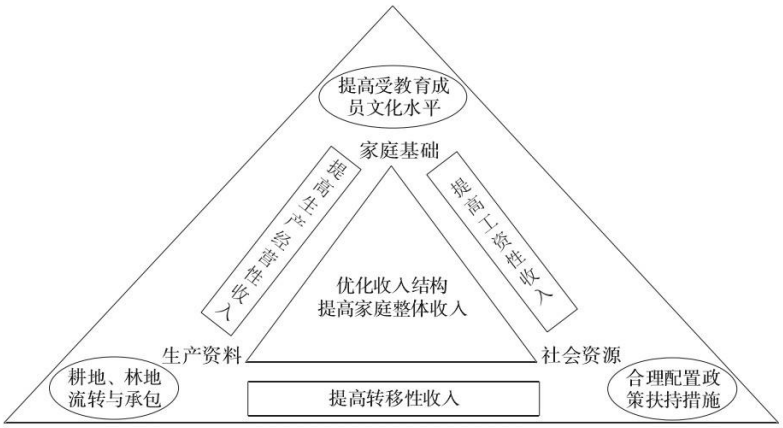

图 4 易地搬迁农户收入结构优化路径分析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影响收入高低和结构转变的影响因子，得出以下结论：①影响收入结构的单因子解释力依次为家庭类型（0.4440）>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0.3612）>抚养比（0.2845）>人均耕地面积（0.1153）>人均林地面积（0.1135）>享受到户政策的数量（0.0859）>贷款难易程度（0.0589）>安置点至最近城市距离（0.0375）>基础设施满意度（0.0152）；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家庭类型、综合受教育程度作为影响各类型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在后续的帮扶措施中应注重加强对完整度较低的家庭和拥有在校学生的家庭在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帮扶，做好后续巩固提升工作。②各影响因子作用于家庭工资性、生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的贡献度有所不同，在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对工资性收入的贡献度，影响因子依次为 $x_1>x_3>x_7>x_4>x_2>x_5$；对生产经营性收入的贡献度，影响因子依次为 $x_{10}>x_8>x_7>x_2>x_4>x_6$；对转移性收入的贡献度，影响因子依次为 $x_3>x_7>x_8>x_2>x_1>x_4$。③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巩固提升政策，因户施策地选取适宜家庭未来生计生活提升的收入结构优化路径。引导参与搬出地土地流转和旧房屋拆除复垦的农户，以外出或就近务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引导有意愿参与安置地产业经济发展的农户，以经营性活动作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对于不同家庭类型的农户，因户施策实施脱贫攻坚巩固提升措施。

考虑到研究的现实意义，根据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的易地扶贫搬迁家庭生产生活条件，进行科学分析和预测，结合农户自身的发展特点、现实需求和国家的政策，将适宜的扶贫政策、措施“多策共施”，建立完备的“政府+专家+易地扶贫搬迁户”后续帮扶机制，在政府主导下，使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汪洋.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推进脱贫攻坚[J].行政管理改革，2016(4):4-13.

[2]郑子青，郑功成.消除贫困：中国奇迹与中国经验[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2):39-48.

[3]张伟，黄颖，何小伟，徐静.贫困地区农户因灾致贫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精准扶贫[J].农业经济问题，2020(12):28-40.

[4]司静波，王艺莼.决胜阶段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性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6):66-71.

[5]李聪，王磊，李明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7):140-150.

[6]邝希聪.货币政策引导下中国金融减贫的机理与效应[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4(2):72-83.

[7]Koen Caminada,Kees Goudswaard,Wang Chen.Antipoverty effects of various social transfers and income taxes across countrie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20,154(3):1055-1076.

[8]尹志超，郭沛瑶.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4):64-83.

[9]王小华.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5):67-77.

[10]祝伟，汪晓文.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4):137-142.

[11]蔡磊，罗庆，李孟林.欠发达农区家庭贫困的动态转变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1,40(3):468-476.

[12]张琛，彭超，孔祥智.中国农户收入极化的趋势与分解——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证据[J].劳动经济研究，2019,7(2):21-41.

[13]沈宏亮，张佳.精准扶贫政策对建档立卡户收入增长的影响[J].改革，2019(12):87-103.

[14]涂圣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政策导向与战略重点[J].改革，2020(9):118-127.

[15]赵双，李万莉.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困境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社会保障研究，2018(2):106-112.

[16]黄征学，潘彪，滕飞.建立低收入群体长效增收机制的着力点、路径与建议[J].经济纵横，2021(2):38-45.

[17]叶青，苏海.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5):64-70.

[18]翟绍果，张星，周清旭.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15-22.

[19]宁静，殷浩栋，汪三贵，等.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20-28.

[20]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19,19(1):58-68.

[21]周恩宇，卯丹.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2):69-77.

[22]赵志卿，杨海娟，李飞，等.农户收入结构差异归因及优化路径选择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8(6):893-901.

[23]游宇，李东升，王昭力.对湖北易地扶贫搬迁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财政，2017(12):43-45.

[24]郭志刚，黄可尤.中国不同家庭类型人口分性别年龄和户主状况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2(5):28-35.

[25]曹广忠，边雪，赵金华.农村留守家庭的结构特征与区域差异——基于6省30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3,19(4):2-10.

[26]陈毅华，苏昌贵.基于六普数据的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1):21-26.

[27]张笑寒，陈毓雯.内生动力视角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收入效应[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5(6):88-94.

[28]邓峰，丁小浩.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J].社会学研究，2012,27(5):24-46.

[29]张正峰，赵伟.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J].经济地理，2007,27(1):137-140.

[30]李娅，姜春前，严成，等.江西省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效果及农户意愿分析——以江西省永丰村、上芫村、龙归村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12):54-61.

[31]杨龙，李宝仪，赵阳，等.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2):134-144.

[32]姚博，汪红驹.高铁、市场整合与区域高质量发展[J].产业经济研究，2020(6):1-14.

[33]骆永民，樊丽明.农村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及农民满意度研究——基于山东省 44 个行政村的实地调查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12):67-73.

[34]黎洁.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9):44-52.

[35]黄祖辉，王敏，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3(3):70-75.

[36]邓峰，丁小浩.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J].社会学研究，2012,27(5):24-46.

[37]祁毓.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0(9):45-56.

[38]万年庆，李红忠，史本林.基于偏离—份额法的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演进的省际比较[J].地理研究，2012,31(4):672-686.

[39]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报，2017,72(1):116-134.

[40]张兰，冯淑怡，陆华良，等.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村庄调查数据[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11):32-39.

[41]胡初枝，黄贤金，张力军.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1):184-186.

[42]刘娜，Anne de Bruin.家庭收入变化、夫妻间时间利用与性别平等[J].世界经济，2015,38(11):117-143.